



早期全真道教 思想探源

李延仓 著

齊魯書社



早期全真道教

思想探源

李延仓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全真道教思想探源/李延仓著. —济南:齐鲁
书社, 2014. 8

ISBN 978-7-5333-3235-8

I. ①早… II. ①李… III. ①全真道—哲学思想—思
想评论 IV. ①B95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0556 号

早期全真道教思想探源

李延仓 著

-
-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3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235-8
定 价 39.00 元
-

序

丁原明

李延仓同志的研究领域涵盖了道家、玄学、道教和易学多个方面。自2011年我与他及白如祥博士合著的《早期全真道教哲学思想论纲》于齐鲁书社出版后,他又于2012年在该出版社出版了《〈庄子〉哲学思想论纲》,于201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道体的失落与重建——从〈庄子〉、郭〈注〉到成〈疏〉》两部自著,开始了独立创作专著的学术历程。当然,他的这两部已出版的自著并非出于这两年一时的创作冲动,而是在初做博士生时就开始资料的搜索、阅读、整理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若干学术论文后,才陆续动笔写成专著的。

更值得惊喜的是,李延仓的新书稿《早期全真道教思想探源》,现在亦被齐鲁书社接受,即将梓行。实际上他的这部新书稿也是在其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定下来的选题,经过日后的深入查阅和拓宽有关资料,并殚精竭虑地加以梳理和思索,终于打造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李延仓这部新书稿的选题很有学术意义。其一,目前学界对全真道教的研究,无论采取道教史抑或哲学逻辑分析的方法,都不过是沿循线性时间的“顺流而下”的思考方式,很少“有意识地采取‘溯流而上’的方法去系统追寻全真道的思想渊源”。

李延仓主张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去同时推进和梳理全真道思想的“源”与“流”、“来龙”与“去脉”(该书《引言》),这无疑属于研究方法或思考方法上的创新。其二,全真道在“三教平等”、“三教合一”的视野下,善于接纳儒道释等各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内容上似乎显得比较庞杂。但李延仓在引用冯友兰先生对“杂家”的论述后,强调“全真道理论不是‘杂家’”,它“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即以内丹修炼为中心的成仙证真信仰”(该书《引言》),这种判断既符合全真道理论体系的建构,又为我们怎样处理文化上的互融互动问题留下了深刻思考。全真道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动机是要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成仙信仰,而在中西、中外文化互融互动的今天,我们吸纳或借鉴中、外文化的意图同样也是为了充实和丰富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与理想,更好地坚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民族性,而不是削弱中国文化的固有地位和损害民族感情。从这个意义说,李延仓的选题则暗含着某种现代学术价值。

《早期全真道教思想探源》除《引言》、《结语》外,凡8章,20余万字,涉及了全真道教的儒学思想探源、道家思想探源、传统道教思想探源、重玄学思想探源、内丹学思想探源、佛教思想探源、易学思想探源、心性哲学探源8个问题。如前所述,研究道教的方法可以采用道教史或哲学逻辑分析的方法。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田野考察的方法、社会学调查方法、考古学方法、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等等。但是对道教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探源”,尤其将道教思想投放在诸多文化因子的源流中而采取“溯流而上”的研究方法进行探源,这在目前已出版的论著中似乎尚不多见。从这方面说,《早期全真道教思想探源》一书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退一步说它对这方面研究的萌动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廷仓的这部新著,它有如下特色。其一,资料翔实。该书涉及儒道释等8个领域的资料选择、考证和运用,这就要求作者既要熟谙全真道教的资料,又要弄清楚全真道教与儒道释等8个领域相应关系的资料,否则将难以厘清所要探研的“源”、“流”。换言之,要厘清全真道教思想的“源”、“流”,就必须首先拿出铁的资料证据来,然后才可以进行义理分析。我觉得该书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它除了在行文中以扎实的史料作穿针引线外,还专门对相对应的资料列表加以证明。像第一章《全真道教与儒学》、第二章《全真道教与道家思想》、第三章《全真道教与传统道教》、第七章《全真道教与易学》等,都以翔实的资料列表,对全真道教思想的“源”与“流”做了有力的证明。其二,探析中屡有新见。该书论述不俗,对某些问题的探析屡有新见。例如,一般认为早期全真道教重性功而轻命功、忽视斋醮、科仪及法术。与这种看法相反,该书在第三章《全真道教与传统道教》开设《对传统道教科仪、法术的传承》专题,对此种看法做了纠正,并列表证明王重阳祖师和全真七子“非常重视并积极参与斋醮科仪活动”(该书第77页)。其次,第四章《全真道教与重玄学》,一方面肯定全真道教有“重玄学”情结,又指出全真道教不是简单地沿用重玄学,而是在“神仙意涵的精致化”、“修炼工夫的落实”、“‘真行’的突显”方面超越了偏重信仰玄理的重玄学,从而将早期全真道教带入了“性命双修”、“内外兼修”的修炼境地。再次,第七章《全真道教与易学》,把易学思想纳入了全真道教思想的源流,实是加深了对该道派丹道思想的诠释。因为“丹道统于易中”(孙不二《坤诀》),不明易理难以修成丹道。该书专门设章探讨易道与丹道的关系,应属于新见。其三,逻辑清晰。该书虽然采用了“溯流而上”的“探源”方法,但其对道教史内容的论述仍然是坚持了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两者互济互补,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使全书的逻辑框架显得格外清楚。

当然,李延仓的这部新著也并非完美无缺,其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错误,诚恳欢迎学界同仁赐教。也希望他对有些问题继续作深入挖掘,精进不已,不断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以此为序。

2014年8月于如意苑翁舍

071	张其成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二
08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六
13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一
18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二
23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三
28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四
33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五
38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六
43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七
48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八
53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九
58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十
63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十一
68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十二
711	陈国符论全真道教与儒家诸子	十三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全真道教与儒学		7
一、全真诸子的儒学化		7
二、对儒家人物、经典的援用		11
三、对儒家伦理的渗透		19
第二章 全真道教与道家思想		26
一、全真道教与老庄道家		26
二、全真道教中的其他道家因素		39
第三章 全真道教与传统道教		47
一、对传统道经的重视		47
二、对传统道教事迹的融摄		56
三、对传统道教科仪、法术的传承		75
第四章 全真道教与重玄学		93
一、重玄学在宋元时期的影响		93
二、全真道教对重玄学的接引		111
附：全真南宗与重玄学		133
第五章 全真道教与内丹学		147
一、从外丹学到内丹学		147

二、全真道教的内丹理论	158
第六章 全真道教与佛教	180
一、研修佛教经典	181
二、援用佛教事迹	183
三、融摄佛教义理	189
第七章 全真道教与易学	199
一、全真道教与易学	199
二、郝大通的丹道易学思想	213
第八章 全真道教哲学的心性化	240
一、禅修观	240
二、经书观	243
三、丹道观	245
四、神仙观	249
五、意义	253
结 语	256
参考文献	262
后 记	275

引言

全真道由王嘉(重阳)创始,与太一道、真大道并为金代三大宗教。全真道虽然兴起较晚,距东汉道教正式形成已有千年之久,但其创立后迅速得到发展,元代以后即成为与正一道二分天下的全国性道教宗派。陈垣先生曾言:“全真之初兴,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一隐修会而已。世以其非儒非释,漫以道教目之,其实彼固全真也。”^①的确如此,全真道在创立之初基本上是以庵舍为据点,以“社”、“会”为组织形式,规模并不显赫。^②就庵舍而言,无论是王重阳在陕西修道时所建后又被烧的刘蒋庵,抑或是其到达山东后马钰为其建的“全真堂”,应该都是规模不大的庵舍。就“社”、“会”而言,其“三州五会”在创立伊始会众不是很多,组织规模也不是很大。但全真道却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教派,在道教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当然,这种奇迹的创造并不是

^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② 唐代剑指出:“对于众多的信徒,王嘉是用‘社’、‘会’这种形式组织的。所谓社会,是古代基层里社中志趣相投者为了某件事或某项活动而结成的一种民间团体。它是由先秦社日时,同区域的人联合举行演艺集会演变而来的。宋代从乡村到城市都有社会。……每一社会有‘社头’或‘会首’为召集人,负责募集钱财,按时间与地点通知社会成员参加活动。”(唐代剑:《早期全真教研究四题》,载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偶然的,它既有社会、政治、人为等因素,也取决于全真道自身的理论因素及宗教特色。

就全真道的研究而言,如果从清陈教友(铭珪)的《长春道教源流》算起,至今已有130余年的历史。然而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全真道的研究成果寥寥。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大致主要有陈垣先生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及其编纂的《道家金石略》等少数论著。^①整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千年初全真道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并一直持续至今。其间,无论是有关全真道研究的会议还是相关论著的发表都显著增加。近年来,全真道研究在以下一些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一是全真道文献整理,即从《道藏》、《道藏辑要》、《藏外道书》以及地方志等文献中整理、析出全真道教的史料。如齐鲁书社2005年出版了由白如祥、赵卫东集校的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的著作。

二是全真道碑刻整理,即借助地方志等文献乃至进行田野调查,挖掘碑刻等金石文献中涉及全真道教的史料。这方面的成果以王宗昱的《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亚魁的《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赵卫东的“山东道教碑刻集”系列等为代表。

三是全真道学案整理,即利用已有的史料做全真道代表人物的学案,以期呈现他们各自的生平事迹及其对全真道发展的贡献。如齐鲁书社推出了《全真学案》第一辑,其中包括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玉阳、郝大通、尹志平、李道纯、刘一明、王长月及陈致虚等人的学案。

^① 关于全真道研究的概况,详参牟钟鉴等著《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齐鲁书社2005年版)附录四《全真道研究论著要目》,张广保《全真教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4期),陈明、吕锡琛《全真道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等论著。

四是断代全真道研究,如张广保的《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2008年版)、赵卫东的《金元全真道教史论》(齐鲁书社2010年版)、尹志华的《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

五是地方全真道研究,如吴亚魁的《江南全真道教》[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版]、汪桂平的《东北全真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

除了以上研究成果,学界还在全真道的创教、传承、信仰、哲学、丹道、养生、医学、伦理、美学、文学、政治、经济、宫观、戒律、科仪、法术以及重要人物、三教关系、地域影响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次全真道研讨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被收入相关会议的论文集中。

当然,在全真道研究也有不少众说纷纭、存在争议的问题。比如:(一)对于王重阳创教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王重阳仕途不利、家财遭劫所产生的挫败感、落魄感所致;有人则认为是其忠于宋室、从而有意识地保存文化、积蓄力量所致;还有人认为是其在乱世中觉悟生死无常所产生的虚无、幻灭感所致。(二)对于王重阳选择山东传教,有人认为是因为其看到了齐鲁文化具有浓厚的仙道传统,有利于创立宗教;有人认为是因为太一道、真大道已经创立,不仅获得了众多的信众,而且得到了金朝廷的承认;还有人则认为其事先并没有在山东创教的意图,只不过在东行过程中传道多有不顺,愈行愈东而已。(三)对于全真道在较短的时间内创立并发展起来,有人将其归因于王重阳善于经营及其个人魅力;有人认为是全真七子的积极推动所致;还有人认为是由当时山东境内较为宽松的宗教环境所致。(四)对于丘处机西行劝谏元太祖“止杀”,有人认为主要是丘氏出于推动全真道发展的需要;有人则认为出于丘处机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五)对于丘处机劝谏元太

祖的效果,有人认为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有人则认为效果甚微,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六)对于全真道的科仪、法术,有人认为极度缺乏、基本没有;有人则认为其相当重视、内容也相当丰富,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继续深入研究、探讨。

但无论如何,学界取得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全真道的研究。不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目前全真道研究的不足或薄弱环节。比如,金源璠在《终南山神仙重阳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①中把王重阳与佛教的达磨(摩)、儒家的子思相提并论,这实则反映出全真道的特色之一就在其宗教义理或哲学理论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达磨是中国禅宗之祖,而子思所作《中庸》也被儒家学者视为“孔门传授之心法”^②,它们分别代表了佛、儒二家最精深的妙道和义理。毫不夸张地说,就哲学思想的深刻性、丰富性而言全真道绝不逊色于佛教的禅宗与儒家的义理之学。易言之,全真道产生后,能够发展成为与正一道二分天下甚至超过正一道的大道派,其特色就体现在其宗教哲学理论上,它是中国哲学史、中国道教史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然而,目前学界对全真道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客观言之,不少学者是从思想史或道教史学的视角切入而对全真道展开研究的。尽管他们在全真道与金、元时期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研究乃至在某些重要史料的发掘上取得了不少突破,甚至有些成果是必不可少

① 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50页。

② 在“四书”的为学次第上,朱熹把《中庸》列在最末,对此蔡方鹿先生指出:“朱熹认为,尧授舜,舜授禹,三圣人相传授受以中的原则,中道便是道统传授的重要内容。朱熹把《中庸》体现的‘孔门传授心法’与《论语·尧曰》的‘允执其中’及《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相联系,阐发其道统思想,这在道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的铺垫性、基础性的研究,但其研究指向绝不能使我们忽视了对全真道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不仅如此,当前全真道研究似乎还有一个表现,即倾向于沿着全真道的逻辑发展脉络按照金、元、明、清进行“顺流而下”的研究,而较少有学者有意识地采取“溯流而上”的方法去系统追寻全真道的思想渊源。我们认为只有这两种研究方向同时推进才能更好地梳理出全真道思想的“源”与“流”,“来龙”与“去脉”,从而使人们加深对全真道内涵的理解,清晰地窥见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平心而论,这恰好是笔者酝酿、撰写本书的初衷。

我们认为,全真道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它以开放的视野融合了儒学、道家、传统道教、佛教及易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表面看来,这些思想资源“杂而多端”,而实际上它们已经整合成了全真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冯友兰先生在论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时都曾论及“杂家”,他精辟地论述道:

杂家……不在自然、社会、人生中发现问题的,而是在别人的体系中看别人怎么样解决问题。他们徘徊于别人的体系之间,企图发现他们所认为是精华的一部分,摘取下来,拼凑成为自己的体系。这就好像小孩子玩积木一样,用几个木块拼凑成亭台楼阁。这些楼阁都是空中楼阁,因为他们是没有基础的,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它们戳倒。^①

又说:

杂家的人,自觉地要搞一个拼盘式的思想体系。有一点这样菜,有一点那样菜,齐齐整整地摆在一个盘子里,看起来也许很好看,但吃起来各有各的味道。杂家的人,从这一家取一点,从那一家取一点,把它们抄在一部书里边,但读起来各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5页。

家还是各家。这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把一部书的内容贯串起来,它实在是不成为一部书。凡是一部书,无论多么大的书,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贯串于其中,这才成为一个体系。杂家之所以杂,就在于它不能成为一个体系。^①这里,之所以不避冗长援引冯先生的话,是想说明全真道理论不是“杂家”,王重阳等人不是二流的哲学家。相反,全真道理论中包含着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真切体悟,也包含着解决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的方法。不止如此,全真道也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即以内丹修炼为中心的成仙证真信仰。质言之,全真道的诸种思想资源并不是各自独立、毫无联系的“拼盘”,而是已经被全真道消化吸收而不分彼此,它们的有机结合使全真道实现了宗教思想体系的成功建构。

尽管如此,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仍会把全真道的诸种思想资源分别“摘取下来”。但是,这并不等于否定其是有机联系的整体。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说的“早期全真道教”主要是指王重阳和全真七子时的全真道教。因此,我们在论述过程中所依据和使用的材料也主要是取自王重阳和全真七子的作品。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第一章 全真道教与儒学

儒学是全真道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不仅王重阳和“七真”皆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而且他们还与众多的儒家学者诗词酬唱、互相交往甚至吸引这些儒者加入全真道。为了推动全真道的发展,重阳和“七真”还要求弟子们阅读儒家经典,从而使全真道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未与儒学绝缘。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儒学思想的滋养,全真道的理论创造力和思想辉光将会大为减弱。下面,即对全真道与儒学的关系作一论述。

一、全真诸子的儒学化

《北史·儒林传》称:“儒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诚然,儒学出现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实现一次次理论蜕变,并延展、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官学化乃至宗教化的儒学成为历代政权道德教化、秩序调控、政治治理的重要凭借,并进而内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积淀为人们的社会心理。面对先进的儒学文化,全真道所值的金代政权也有意识地采取了尊孔崇儒的方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重阳祖师和“七真”这些道门人士也成

为儒学慧命的传承者，而其儒学化经历集中而清晰地反映在他们的传记材料中。

先说重阳祖师。据史料记载，王重阳家族显赫、家业丰厚，他年少时即“读书系学籍”，早通经史，弱冠则“修进士举业，籍京兆府学，又善武略”^①，并且才思敏捷、善属文，可谓是文武双全之俊才。如此看来，其有极深的儒学根底。不仅如此，甚至其出儒入道也与儒学有关。据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二记载，王重阳四十七岁时曾喟然叹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吾今已过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纡紫怀金，不亦太愚之甚乎？”接着，其“遂辞官解印，黜妻屏子，拂衣尘外，类楚狂之放荡焉”^②。由此可知，正是由于孔孟儒学对生命的感悟和人生智慧激发了重阳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实现了思想境界的升华，并最终转化为其超俗入道的动力。全真道创立后，宣扬儒学也始终是王重阳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甘水仙源录》卷一载：“今观终南山重阳祖师，始于业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其在文登、宁海、莱州，尝率其徒演法建会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思（应为‘私’——引者注）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③这则史料至少包含三个与王重阳儒学活动相关的信息：其一，接人使读《孝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其二，立说多引“六经”；其三，“三州五会”明儒学正心诚意、少

① 《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甘水仙源录》卷一。

② 《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页。下引《道藏》，仅注册数和页码。

③ 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26页。本书所引《王重阳集》、《马钰集》、《丘处机集》、《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集》皆取自齐鲁书社2005年6月出版的“全真道文化丛书”，下文重复引用时只注书名、页码。